

前不久落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让京西宾馆进入人们的视野。事实上,低调得连招牌都没有(只有门牌号)的京西宾馆一直是中央讨论和决定重要问题的场所之一。“文革”时期,它还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成了所谓的“走资派”的庇护所。

周恩来令京西宾馆筑墙阻挡造反派



▲京西宾馆外景

老师“大闹京西宾馆”保萧华

京西宾馆1959年开始筹建,对外称将建造“八一饭店”,设计为军队招待所,仅供接待国外军事代表团和军委内部会议使用,不对外营业。直到1964年9月14日,宾馆才开始营业,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根据其地理位置定名为“京西宾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不断升温,京西宾馆成为备受冲击的焦点。

196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碰头会。就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问题,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3位老师同江青等展开了激烈争论。要求军队开展“四大”的江青占不了上风,就祭出了攻击萧华的牌:“萧华是刘志坚的黑后台,部队执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彻底,是萧华打马虎眼!”她还质问:“萧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叶群随声附和。一时间,批判萧华的发言稿如纸片般飞来,在未弄清江青代表谁发言的情况下,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今天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谁料会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竟在排以上的干部会上做了传达。19日当晚,萧华家被抄,幸而他听到风声从后门脱身,赶到叶剑英住所求救。

1月20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召开。听萧华讲了前一晚的情况,徐向前气得直拍桌子。江青则惊讶地问萧华是怎么逃出来的。叶剑英大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叶帅一边说着,一边拍案呵斥。江青等人被镇住,而“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这样传开了。

许世友受冲击摆出“水雷弹”

老师们大闹京西宾馆后,一大批地方和军队受到冲击的干部在那里暂避风雨。很快,京西宾馆成为“造反派”攻击的重点,仅1967年1月就发生了10余起冲击事件。鉴于此,1月26日中央军委做出决定:“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然而1月28日,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包围宾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无法离开宾馆。

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派了六七百人来抓他。虽然他们被死死堵在宾馆外,但北京造反派的加入让形势越来越危险。许世友见此情形,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一说是张震)等人组织起来,将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一说是十二楼)做“水雷弹”。他下令让工作人员关闭电梯,伺遣造反派冲上楼,就往下倒开水。

准备就绪后,许世友给周恩来、林彪等人打了电话并请转报毛泽东。他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就向谁开枪!”

周恩来怕双方闹起来引起大祸,立即让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跟徐向前去做许世友的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做造反派的工作,造反派这才撤出了京西宾馆。

宋任穷差点被造反派吊走

经许世友一事,周恩来对京西宾馆的保卫工作更加上心。1967年2月,他指示傅崇碧:“京西宾馆从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此外,宾馆接待室还安装了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1967年,中央将大区 and 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集中到京西宾馆住。东北局第一书记、开国上将宋任穷住在6楼东头,时常有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揪斗他。最危险的一次是8月21日,来自东北的造反派仗着人多,一部分人从警卫战士的头顶越过,冲破警戒线,直奔宋任穷的房间,把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好在傅崇碧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及时赶到,将宋从造反派手中夺回。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很生气,他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要求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京西宾馆的围墙就是那时突击建成的。“八二一事件”后,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一直到“文革”结束才又恢复常态。(据《党史博览》、《国家人文历史》)

刘伯承力排众议 启用首位“女参谋”

抗日战争中,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渡河东征之后,大批知识分子涌进了刘伯承所在的一二九师。

一天,一个姓郭的女大学生到师部找师长刘伯承。刘伯承热情地接见了这个女大学生。交谈之中,刘伯承得知她为寻找抗日救亡的军队,曾去投考国民党中央军校,几经周折后才跑到太行山来投奔八路军。她向刘伯承师长直接提出想当作战参谋。刘伯承从心里赞赏这个女青年的胆识,便答应把她的请求向组织反映。女青年走后,刘伯承师长立即征求作战科长和参谋们的意见。大家非常欢迎大学生战友到自己队伍中来,可一听是个女大学生要来当参谋,大家都不同意。

刘伯承有些生气地问:“人家是大学生,有文化,你们为什么不娶?她一心抗日。先去考中央军校,人家不要她;咱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什么也不使用人家?张国焘思想流毒的那个‘鬼’,还在毒害你们呀,要认真打‘鬼’才行!”

参谋们都哑口无言了,最后不知是谁壮着胆子从嗓子里嘟嘟挤出几个字:“女的,干军事……”

话还未了,刘伯承就开始反驳:“女的?女的照样领兵打仗,挂帅称将。咱们苏区和红军中,娘子军连,女兵队有的是,干军事当师长、游击队长的也不少,你们都忘了?怎么越革命思想越倒退?”参谋们觉得师长说的有道理,但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有人说:“既然组织上都同意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举双手欢迎!”刘伯承师长听出大家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想通,便说:“我可不光是双手欢迎,我还要先伸手去向组织上要她哩!免得别的部门先要走了!”听了这几句话,大家深感师长对人才的爱惜。

郭同志的申请很快被组织批准,她成了一二九师第一个女侦察参谋。不久,郭同志就立了战功。她奉命去侦察鬼子的一个炮楼,执行任务时突然受到袭击,敌人的流弹打中了她的腿。郭同志凭着顽强的意志,拖着伤腿,回到了司令部。她顾不上包扎伤口,就急着向领导汇报印在脑子里的那张敌情图。然后,她才住进了医院。刘伯承听说后,亲自到医院看望了这位女参谋。他经常用郭同志的例子教育轻视大学生、特别是轻视女大学生的同志。大家深受教育,思想上发生了较大转变。

(据《北京日报》)

(据人民网)

周恩来反对特殊化官僚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确定政务院各部门领导人选时,有的人提请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一项职务。邓颖超在革命过程中有着深厚资历与突出贡献,当个部长实不为过,但遭到周恩来坚决回绝。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

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

周恩来的亲属,晚辈们都知道,他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更不能利用他的关系。对此,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15年的侄女周秉德有着切身的体会。

在周秉德的记忆中,伯父对亲属的要求十分严格,他总说:我们是共产党,不能搞像封建社会那样的裙带关系,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秉德毕业后在北京一所学校当老师,不到3个月被调到朝阳区委去搞“肃反”了。周恩来说听后严肃地责问她:“你

怎么不当教师了?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给你特殊照顾?”周秉德感觉很委屈:“不是啊!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谁,是为了开展‘肃反’工作,上级临时抽调一些党员到区委工作的,我们学校的党员就那么几个。”

1963年,周恩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着重讲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曾将“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定义为“特殊化的官僚主义”予以坚决反对。当前,有的地方领导干部,或为了一己之私,将党纪国法抛于脑后,贪污受贿;或纵容家人搜刮钱财,危害人民群众利益,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